



北京奥运会的仪式学解读

杨红

摘要: 北京奥运会是一种历史记忆,还是一种具有永恒现代性指意的仪式,其呈现出来的宏大的叙事性压倒了中国对奥运会赛事内涵的记忆,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纪念碑。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的国家秩序变更后催生出来的仪式化产物,它还是一种对中国固有仪式的升华形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取得了 51 枚金牌是由于举国体制的制度支撑,北京奥运会就此得以升华为一种中国内产式国家仪式。奥运会还是一种身体展示度极强的仪式活动,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北京奥运会也成为中国人寻找与西方社会和解的突围点。北京奥运会缔造出来的强大的超仪式的视听镜像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在更高的意义上重塑了国民形象。

关键词: 北京奥运会;仪式内化;国际意义;理念呈现;表演异化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6-0024-06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tes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YANG Hong

(Publicity Department,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 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a ceremony filled with eternal modernity meaning. The narra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overwhelmed the Chinese people's memory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lympics and formed a cultural monument of China's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a ceremony product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national order of China and is a sublimation form of the inherent Chinese ceremonie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carried off 51 gold medals at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is is due to the support of a national system. Thus, the Beijing Olympics was promoted as a national ceremony. The Olympics is also a ritual activity of physical display with strong performativity.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became a breakthrough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eek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Western society. The powerful super ritual image created by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has enhanced th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as reshaped and upgrade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Key Words: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ternalization of rite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idea presentation; alienation of performance

北京奥运会在世界奥运会的历史上或许只是寻常一站,但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却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传播的不对称规律强化了北京奥运会的超体育本性,记录并描述下了其所呈现的符号化瞬间,北京奥运会也缔造出一种称经典景观。从金牌至上主义的视野来看,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极有说服力的 51 块金牌造就出一种现代仪式,而北京奥运会自身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构成了另一种仪式,其呈现出来的具有十足宏大叙事风范的场景几乎压倒了中国人对奥运会赛事内涵的记忆,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竞技本体的时空镜像。

1 北京奥运会的民族主义驱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并不认可苏联等国家以外的西方国家

的很多文化活动的合法性,但认可了奥运会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并一度打算参加 1952 年的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然而,国际奥委会于 1954 年在雅典召开了第 49 届会议,会议决定了奥运会在接纳中国大陆的中华体育总会的同时也接受了台湾的体育组织,这场会议客观上制造了两个中国的格局。中国政府于 1958 年 8 月随即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及其 9 个单项国际体育联合会的关系。在 1952 年到 1979 年的 27 年间,中国有整整 5 届奥运会未派任何人参加。

奥运会是西方文化的显性符号,然而,百余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中国人一直徘徊在接纳与臣服、抗拒与灭亡、改造与失准、排异与退化的两难境界中。从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开始接纳同样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直至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本土文

收稿日期: 2016-10-07

作者简介: 杨红,女,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E-mail:867845432@qq.com。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宣传部,无锡 214122。



化终于让出了主流地位,中国也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主导地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其战略目标是夺总分第一。该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用国家机器,建立了独立而庞大的竞技体育系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苏联从参加奥运会之日起,夏冬季奥运会的总分都一直保持前两名。”^[1]20世纪50年代开始后的十余年内,中国一度与苏联有过一段情谊缠绵的美好时光,至少一代或两三代中国人受到了苏联文化及艺术风范的熏陶和影响。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现代人类学似乎还在与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所喜欢的启蒙问题作斗争。不过,它的斗争对象已经变成了一种与欧洲扩张和文明的布道类似的那样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两个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这在最近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本意确实并非要减少被启蒙出来的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对立。相反,与旧的哲学支配一样,在西方支配的觉醒过程中所展露出来的‘现代化’与‘发展’之意识形态变成了基本的前提。甚至左派对‘依附’和资本主义‘霸权’的批评,同样是对本土人类历史上的能力和他们文化的生命力持怀疑态度的观点。”^[2]还须回归到身体学的领域。中国人一度在身体学的场域里失去了自信力。中国和西方学者反复阐释过中国人过度文雅、不尚强悍生活的风气,其实,在儒学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还在发酵,并已然成为一种现代生活常态。20世纪50和60年代出生的两三代中国人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指引下,中国人逐渐确立了一种军事化的思维准则。那些年间的标语充满了战争意味,学校里普遍流行“七亿人民七亿兵”的训导式口号,城市和乡村的街头到处都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军事化宣传标语。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红小兵都一度天天念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时时都要看到满墙壁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30年时间里,人们放弃了儒学的优雅化的生活方式,开始崇拜悲剧式生活理念。人们讴歌苦难,向往穷困,崇拜英雄,膜拜权威,赞美乌托邦,甚至对牺牲也充满了渴望。出现那样的社会风气主要还在于全社会出现了一种极度陌生化的社会时尚。那个年代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一度出现倒置、对立甚至敌视状态,双方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积聚了强烈的妖魔化对方的经验。在北京获得申办奥运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西方社会、中国和奥运会的关系曾经呈现出一定的紧张,其中充满了高度的非和谐性。1984年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带有强烈符号性和象征性的时间节点,中国代表团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在此后的若干年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历届奥运会。在中国力量崛起的态势启发下,悉尼奥运会成为中国竞技体育腾飞的起点,而雅典奥运会则为中国初步竖立了世界体育强国的招牌。不少中国人开始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展开想象。

客观而论,国际奥委会的确是一种相对中立化的国际组织,具有非同寻常的均衡性、公平性、健康性理念。正因如此,世界各国人士对奥运会的认可度急剧攀高,当今世

界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已经很难拒绝奥运会强大的召唤力量。由于商业与政治利益的诱惑,举办奥运会几乎成为当今世界各大国奋力参与的必修课。由于众多国家的追捧,奥运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更加高涨,申办奥运会变得酷似一场社会性的攀附行为,奥运会一时间成为一种更为普世化的宗教活动。

中国和奥运会的关系十分复杂,且一度充满了戏剧性。中国于1993年和澳大利亚竞办奥运会,以43票比45票的落差败北。此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再度抬头,中国的文化界开始介入体育话题。“20世纪后期的‘高等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全球化必将取代所有形式的文化并横扫整个世界。”^[2]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失利激发了中国民间性的逆反心理,一种与西方高度对立的情绪随时都会酿成一种更加宏大的潮流。“申办奥运会失败,当受到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之后,中国的一些民众有强烈的愤慨和反抗,就是说,你不是压我吗?那么你算什么东西?……奥运会本身也是一个神话,一个认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神话。我们别忘了,奥运会是西方讲述的超级幻想。……奥运会源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如今成了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3]中国民间人士的话语直接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人一度认为只要和奥运会及其相关组织建立好关系就可以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奥运会同样也会受到其背后强大的西方集团的掌控或掣肘,它再度激发出中国对西方社会长达百余年的怨恨情仇的复杂记忆,并随时都会演化为一种无以言说的非理性的情绪。

2 北京奥运会强化了中国的开放维度

由于媒介造势的偏执态势,在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利后的当晚,中国人几乎无法面对本真的事实。“奥运会的兴起,打出了自由、和平、平等的旗号。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萨马兰奇接任后,它和后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以它的商业性,变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个超级神话,它调和了政治、种族、军事种种东西,它对东方特别具有吸引力。日本、汉城举办奥运会都被认为是他们同西方同步前进的一个标志,成为起飞、超越的神话。在那些竞技场合,白人和黑人跑在同一条跑道上。……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国家民族主义得到了表现。这在幻觉中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就同步了,它潜在地就把西方的价值观念、西方的神话、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领导推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3]面对真实的竞标失利,中国人很难保持平常心。“奥林匹克是西方搞起来的,介入它就介入了西方,我觉得一进入狭隘的意识形态领域,研究东方主义变成了对西方文化的不服气和成为了对现代进程的抵制,这种情绪就需要警惕了。”^[3]中国人的激进心理完全来自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回顾。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失利,体现出一种两重性的创伤记忆,中国人原以为可以凭借一场胜利仪式治疗已经伤痕累累的国民心理,却在旧伤未愈的基础上再添新恨。如果没有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失利事实,也便无法产生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举国狂欢的景象。“2001年7月13日是个金灿灿的日子,是全世界所有炎黄子孙都极度兴奋狂



喜的日子。生活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华夏儿女都能详尽地向你描述那天晚上是如何彻夜无眠地和周围的人欢庆中国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的。”^[4]从1993年到2001年,中国体育人经受了8年之久的焦虑期,终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很多中国人不由得再度想到了近代以来近乎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20世纪,我国的体育发展与经济建设有着惊人的相似。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还处在外族入侵、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体育建设和经济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竟然多次没有人参加奥运会,这是旧中国国力弱小的一个缩影。”^[5]复杂的仪式化生活给中国人带来了强大的刺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以西方文化为恒定指标的国际秩序最终接纳了中国。

中国举办奥运会至少会抢夺掉诸多国家在世界高光地点的亮色。由于国际性仪式本身强烈的超国界与跨文化的媒介冲击力作用,北京申办奥运会注定了是一种高度竞争与惨烈争夺过程的产物。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L·汉德森曾说:“正如荣格博士所言,在这种‘激烈的仪式中,在这种看起来极似向对于可能使青年人望而却步的诸力量的祭献仪式中’,透过英雄恶龙之战的方式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人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与潜意识的丰饶力量隔绝开来的缺失感,本初原型的力量才能被永远征服。在孪生子神话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骄傲狂妄怎样表现为过激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分离。这种分离由它们对于其恶果的恐惧而矫正,恐惧使它们被迫又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的关系。”^[6]中国人急切地申办奥运会源自国家自身的仪式匮乏,同时也蕴含在国际社会上重新验明身份的需求。经历过百余年痛苦磨难的中国人亟欲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中,借以避免被强势的国家在世界性竞争的大潮流中遭受淘汰。

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获准时间是2001年7月13日,2001年也便由此而递进为一种时间的隐喻。中国人终于真实地完成了1908年《天津青年》中的关于奥运会的所有畅想:不仅参加了奥运会,获得了奥运会金牌,还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取得了51枚金牌,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金牌数的最大值。体育界内的很多学者早已认识到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并对其产生了极强的心理依赖性:“运行模式要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体育制度实践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制度统揽全国一盘棋,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有利于攻克难点,化解热点,营造亮点。”^[7]举国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产,从奥运会参赛史上可以看出,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都或多或少采用过举国体制的元素,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一以贯之的官方机构来统筹奥运会的赛事活动,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智库部门、培养机构和一条龙式的后勤服务与保障体系。直到此时人们才认识到了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联接关系。国家体育总局一直站在官方的立场上竭力捍卫奥运会策略的绝对正确性,并将其移植到社会制度的高度上来。“我们有必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

善的制度。’这是江泽民同志国庆讲话中的四个基本结论之一。”^[8]体育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历史特殊性,为此,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一向是一个充满悲情内蕴的机构,一旦遇到有人质疑其存在价值时,国家体总会千方百计地论证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界刚刚结束了一场有关体制优劣的争论,许多思想的余续仍在蔓延,体育界对举国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情性也一度产生了动摇之情,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代表的体育官方派始终是中国体育人根本利益的代言性机构,当时体育界的学者坚决认可了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继承的体育遗产既包括丰富的体育经验和劳卫制、青少年体校、斯巴达克运动会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又含有僵化的体育体制以及高水平竞技体育(在前苏联和俄罗斯,竞技体育分为高水平竞技体育和大众竞技体育,前者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大型赛事,后者即是群众参与的一般性竞赛。为介绍的准确性和后面阐述的需要,本文沿用了俄罗斯的两个术语)与大众体育严重失衡的畸形行业结构等重负。”^[9]体育界对举国体制的认可度一度远远超过否定其合理性的力量:“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兼具管办职能的行政机构一直以来,我国的体育组织管理都是以政府职能为主,由于统管过严,导致宏观调控力度势微,间接致使社会体育组织和企业参与不足。同时,由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管理制度的缺陷,容易出现以权寻租、虚假比赛、暗箱操作等问题。此外,体育资源存在严重的地域分割,体育人才交流的渠道不畅,人力资本存在内耗。由此可见,要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进一步完善举国体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10]由于具备了鲜明的国家性、民族性和荣誉感,中国体育人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优势性生活状态,这些心理体验构成了中国体育人的集体心理,他们在国家的大旗下的确开创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展示出新中国由革命带来的崭新成果。“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三足鼎立的刚性结构。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从新中国成立时体育的百废待兴,到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高居金牌榜首位,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地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竞技体育的腾飞,确立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从基础差、底子薄到跃升至世界‘第一集团’,成为举世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其中,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1]今人仍然站在经济至上的立场上抨击北京奥运会的预算超标问题。里约奥运会后,部分学者将北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做出了对比,认为北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是奥运会举办史上充满对立性的两种极端形态。在一些经济至上论者的眼里,北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确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境界。

先说北京奥运会的成本问题。如果包括拆除建筑的赔偿款项、河北和北京部分地区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停工损失



的费用,北京奥运会的成本可以万亿计,但是,很少有人认为北京奥运会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中国人在此时间节点爆发出惊人的同步性热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还在于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精神磨难,如此的伤痛远远超过了经济损耗带来的微小的感受。这便是北京奥运会耗资巨大却未能引起民众反对的原因。北京奥运会是特殊时代和社会境遇的产物,它体现了国情和国民价值观的特殊性。强大的仪式饥渴需求导致中国人为了举办奥运会不惜动用国家力量,而其内在的生成原理更值得人们深思。

3 作为国家级仪式的北京奥运会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三千年未遇之大变革。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有内变、自变、渐变的原因,也有外来力量干涉的因素,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突变的外在动能。质言之,中国社会的变革更多的来自外部环境。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国家仪式出现了空缺化、流失化和虚白化现象,并催生出了过多的充满激烈对抗意味的所谓的重大仪式的反复更迭现象。仅从国家典仪的情况看,1840年以来的国家典仪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旧中国帝王在特殊时间段纪念性典仪,其中不乏1894年11月7日的慈禧寿辰以及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登基仪式。第二类则带有近代革命性性质,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第三类则为新中国的新型典仪,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以及1999年10月1日第13次国庆阅兵仪式。郭辉曾对中国的民国时期的国家仪式做出界定:“‘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3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行为活动。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将国家仪式与地方或民间仪式作出区分。”^[12]随着儒学伦理体系的解体,中国的政治式典仪出现了突击性、大型化、政治化的倾向,且一直缺乏稳定的生活化、日常化和风俗化的仪式。“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仪式的功能经过了‘国家—领袖个人—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12]无论从任何角度讲,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大型仪式。它本真的社会、风俗与文化震撼力已然超过了体育的范畴,变成了一种超文化的典仪,并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国家仪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51块金牌,为此,中国人一度陷入巨大的惊喜之中,这种喜悦之情一直折射到关注中国体育和社会的各种媒体。来自新闻界的学者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金牌第一的优异成绩使亿万国人倍感欣喜。许多国人开始畅想中国的体育强国光荣梦想,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在已经是体育强国。”^[13]体育界的学者同样携带出针对北京奥运会的一种强烈的溢美之情:“一年之前,在紫禁之巅上演的那场奥运盛宴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点燃了国人胸中蕴藏已久的激情,也把中国体育推向全球的聚焦点。60年弹指一挥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万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伴随着东方巨龙的崛

起,中国体育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次突破和一个个跨越。”^[14]正是在巨大的心理升华的感应性语境下,中国体育界完成了仪式重构程序。当然,仪式性的狂欢和自然的生活并非一回事,北京奥运会一度绚丽多彩,但喧嚣之后注定要给过度亢奋的中国民众带来一种幻灭感。物极必反的原理在任何领域都呈现出一致性。“北京奥运会我国登上了体育竞技的历史高峰,而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体育强国内涵的理性反思。金牌第一能否说明我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15]诸如此类的疑问一时间成为后奥运时代的主流,构建新型仪式的非制度性的隐患依然存在。胡志毅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的规范,即奇理斯玛规范,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个控制包括许多方面,媒介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失去宗教权威控制的社会里,媒介就成了一种中心,这个中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所创造的,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个媒介中心。它是一种媒介和多种媒介组成的,以前是报纸,后来就是广播和电视。”^[16]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无法脱离现代媒介的影响,换言之,媒介和奥运会的联姻构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奥运权力网络。由于现代媒体的强力介入,奥运会已经成为一种融合了仪式感、商业性、欢聚性的集会形式,它蕴含有宗教情愫、财团理想和国际组织的集团意志。抵抗北京奥运会的力量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在北京奥运会过后的若干年的时间内却成为一种隐性的思想和文化流派。

奥运会在中国具有超体育的价值,其特殊性如同另类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存在状态。法国文化学家乔治·维加雷洛认为:“在缺少上帝和精神超越的社会中,体育可以说是体现理想,甚至是神圣的最后一个领域。”^[17]体育盛会很好地避开了无神论社会强大的意识形态统摄力,并适时地成为中国人追求神圣意志的一方特殊的场域。客观而言,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盛会不仅是中国人膜拜的对象,也是当今世界可供全人类膜拜的神圣仪式性盛会。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看来,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东方化的展示程序,并非一种纯正的中国人的国家仪式,甚至不能算作是一场完全属于中国的体育仪式。但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北京奥运会却是中国式的,甚至就是完全属于中国的。北京奥运会的本名是“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中国人至今为止仍然喜欢将其称作“北京奥运会”。中国人很容易将北京奥运会和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系列的文化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借此构成了一种链环性、组合性的文化景观。

奥运会本就是一种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展示每个参与国国家意志的场域,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充满了仪式感的国际力量。奥运会还是一种身体展示度极强的仪式活动,它像许多原始的仪式一样,无法脱离人体表演活动而独立存在。古代奥运会就以裸体性为特质,这种裸体性展示出了一种生命力,更是一种仪式化的集体心理动能,奥运会由此而生发出了特殊的象征意义。郭于华认为:“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特殊场合情境下庄严神圣的典礼,也可以是世俗功利性的礼仪、做法。或者亦可将其



理解为被传统所规约的一套约定俗成的生存技术或由国家意识形态所运用的一套权利技术”^[18]。无论是奥运会自身的仪式感还是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性仪式,都具备多次复制的效能。纳日碧力戈在论述北京那达慕大会的仪式形态时曾说:“文化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是复制。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在复制中存在,在复制中保持价值和意义。所谓‘原汁原味’的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文化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派生,要找到它的客观实在源头,几乎是不可能。我们所说的文化或者文明的源头,是一种根据某些现存实物或者话语形式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和信奉来得到认可。今年的那达慕结束了,明年又即将开始。”^[19]北京奥运会显然就是这样一场中国人十分看重的超大型化的仪式。

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奥运会独特的身份、强烈的仪式感以及对社会病症有效的治疗价值。来自北京市政府的综合性机构认为:“奥运会仪式是指围绕奥运会而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性活动,主要有圣火传递仪式、奥运村升旗仪式、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颁奖仪式等。它们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各种文化特征,是奥林匹克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些仪式不仅给奥运会以浓烈的节日气氛,而且大大提高了奥运会的境界。显示奥林匹克运动的庄严、神圣,并使之更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以此净化人们的心灵,弘扬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20]北京奥运会的仪式性可用两种方式解读,其一,北京奥运会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其二,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更是一种另类的仪式,它属于一种仪式中的仪式。早在2006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就组织人力开展奥运会仪式的研究。“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是受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仪式,它不仅是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人文奥运的标志性成果。”^[21]北京的景观建设一度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在缺乏旅游产业化意识的前提下,北京市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拆除了以外城、内城城墙为代表的诸多的城市文化标识,但仍旧保留了故宫、雍和宫、天坛、地坛等一些世俗性和宗教性建筑,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方更想通过西化后的城市建筑展示出其与国家接轨的一面。在仪式或缺的中国,类似奥运会仪式这样的大型国际化仪式恰是国家、政府和民众共同选择的一种向全世界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的里程碑。“一如萨林斯在其演讲中简略提及的,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呈现方式是所谓‘洋为中用’”的说法。在处理自己的文化之时,他们也在所谓的‘良俗’和‘陋俗’之间,在中国文化范围内不同类型的传统之间作了政治性的区分。在将中国纳入现代化轨道,也就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之‘废墟’上将中国重建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大多数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在谋求如何消除中国人的‘落后’。”^[22]中国的国家仪式可以是一种建筑文化,还可以是一种身体性的表演文化。前者以鸟巢、折扇、水立方为标志,后者以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为标志。北京奥运会的赛事及其开闭幕式都属于一种表演性仪式,两者为中国的仪式匮乏现状增添了缓解性的砝码。

百年来的战争创伤给中国人带来了长久的伤痛记忆,而奥运会是一种模拟战争的游戏,其在缔造国家英雄方面

的作用十分显赫。美国学者约瑟夫·L·汉德森曾说:“在英雄神话与成人仪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鲜明的不同之处。为了达到勃勃雄心的最终目标,典型的英雄人物竭尽了他们的心血。简而言之,尽管他们由于骄傲自大而受到惩罚或死于杀身之罪,但他们依然即刻获得了成功。与之对比,成人仪式的承受者为了接受考验,则不得不放弃充满理想的远大抱负和一切欲望。他必须心甘情愿地经受这种考验,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事实上,他必须准备去死;虽然,他所经受的考验的标志可以是温和的(一段时期的斋戒,打掉一颗牙齿或者纹身),可以是令人痛苦的(包皮环切术、切除附属器官或者其他形式的肢体毁伤),但是其目的始终是一个:创造死亡的象征性心境,从这种心境中,复活的象征性心境将会产生。”^[16]奥运会自身的悲剧性中的痛苦感对中国人而言已然具有象征性,它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人百年磨难的治疗性本体。在此意义上说,北京奥运会几乎成为中国和西方长达百年的文化和社会纠结与冲突的和解仪式,或者说,它是一种顽固的矛盾体的终结性的清理、释放与归正仪式。汉德森强调:“在部落社会里,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成年人仪式(initiation rite)。成人仪式将步入成人行列的仪式承受人带回本原母子人格或曰‘意识自我—潜意识自我’同一性的最深层,以此迫使他体验一种象征性的死亡。换言之,他的人格暂时分解、消融在集体潜意识之中。然后,新生的仪式将他仪式性地从这种状态之中拯救出来。这是真正巩固强化意识自我与更大的团体联体的第一次行动。这更大的团体表现为图腾、部族、部落或者三者的并合体。”^[19]任何一种成人仪式都可以高效地解决族群内部人士的融解与重构问题。郭辉在论述国家仪式的合法性和消解性时曾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国民党利用国家仪式建构党国权威及统治,意味着消解北京政府的权威及统治。再比如说,袁世凯利用国家仪式建构和宣扬个人权威,就意味着消解其他人的权威和利益。”^[12]北京奥运会的仪式性显然超越了既往一切的地域性仪式的功能,它构成了一种中国人急切融入世界的能量。黄玉珍认为:“百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备受欺凌的屈辱史。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洗刷了百余年来屈辱,使得富国强民的时代可望可及。但毕竟是在一个破败的旧世界上建设一个新中国,富国强民多少需要时日。而此时,积聚在人们内心巨大的‘图强’能量急需途径宣泄。于是体育自然而然地承载了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成为了有效宣泄的渠道。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资源整合优势,我国的体育事业迅速崛起。在国力尚不强盛的条件下,体育事业异军突起,以崭新的姿态快速融入到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奥运竞技舞台,屡创佳绩。2008年北京奥运更是以完美的表现诠释了崛起中国的全新姿态,此举极大地慰藉了中国民众迫切图强的心理。”^[12]同时还应看到,现代奥运会还是一种现代性的符号,它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显性符号。当新中国的所有的仪式都在各种理念支配下陷入沉浮升降的全新序列后,奥运会就成为人们大体可以接纳的公共仪式,奥运会的国际性、身体性和原始性都是新中国完全可以接纳之的理由。

中国政府和奥运会的关系可以代表中国和西方唯一



的无群体性心理障碍的沟通方式,中国人在经历了百余年的与西方世界的对立性境遇后终于迎来了另一种全新的生存体验。从2008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北京奥运会的确更像是一种里程碑式的宏大仪式,它所缔造出来的强大的超仪式的视听镜像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并有效地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且在更高的意义上重塑了国民形象。奥运会的悲剧性起源于其内在的人的权力意志的终极对抗层面,其痛感文化和中国人的百年记忆息息相关。

4 结语

中国一度是一个脱离了自身仪式背景的现代国家,北京奥运会的绝对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中国既有悲情历史的显性超越层面,它还构建出一种永续不灭的现代性的类史前神话。表演与展示,妥协与进取,结盟与退隐,简朴与奢华,构成了北京奥运会复合性的文化品质。站在百年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那场超级盛宴,更令人坚信其本身蕴藏的一种柔性而充满人类普泛价值的坚挺的意愿。北京奥运会既是一种体育的盛会,也是一种终结性的国家仪式。它既是一种体育赛事,还是一场国家意志的展示会。北京奥运会在经历了百余年磨难的中国人的心中筑起了一种看似永不坍塌的里程碑。质言之,北京奥运会是一种中国人第一次以平等、自然、安静之心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仪式表演,更是一种重构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符号。北京奥运会的超体育价值已然体现得十分突出,且已成为纪念碑式的国家记忆资本。

参考文献:

- [1] 凌平,金钦昌.当代世界体育强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特点[J].浙江体育科学,1987(4):7-14.
- [2] 王铭铭.灵验的“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引自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13.
- [3] 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J].钟山,1994(1):131-137.
- [4] 梁丽娟.亲历申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
- [5] 王海屹,马晓婕,胡林清.我国体育强国之路对建设经济强国的启示[J].改革与开放,2009(3):72.
- [6] [美]约瑟夫·L·汉德森.古代神话与现代人[M]//张月,译.潜意识与心灵成长.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20-122.
- [7] 刘纯献.建设体育强国的风向标和助推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1):4.
- [8] 《中国体育科技》编辑部.为建设体育强国当好哨兵 对决策起耳目参谋作用——张彩珍同志在各国体育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J].中国体育科技,1990(2):3.
- [9] 颜下里.从竞技体育强国走向注重大众体育的俄罗斯[J].体育文化导刊,2012(10):13.
- [10] 许之屏,廖理连.我国迈向体育强国过程中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J].怀化学院学报,2011(4):28.
- [11] 王庆军.体育与科学的耦合:体育科学研究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J].体育与科学,2013(1):15.
- [12] 郭辉.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16.
- [13] 窦家军.“体育强国”热潮下的冷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11):48-50.
- [14] 王镜宇,汪涌,岳东兴.从体育大国冲向体育强国[J].新闻天地,2009(10):11.
- [15] 陈玉忠.体育强国概念的缘起、演进与未来走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144.
- [16] 胡志毅.现代传播艺术——一种日常生活的仪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49.
- [17] [法]乔治·维加雷洛.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M].乔咪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
- [18]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
- [19] 纳日碧力戈.都市里的象征舞台——在京蒙古族那达慕及其符号解释[M]//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0.
- [20] 苏彦荣,祝心越,沈华.奥运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220.
- [21]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决策研究基地编.北京决策研究报告 2006[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307.
- [22] 黄玉珍.关于体育强国若干问题的思考[J].体育科技,2010(3):2.

(责任编辑:杨圣韬)